

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崔鲁威¹, 王立敏²

(1. 河北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办公室, 石家庄 050051;

2.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街道办事处, 石家庄 050071)

摘要:李大钊与何炳松都是 20 世纪上半期颇有影响的史学家,在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李大钊比较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方法,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蓬勃兴起。何炳松注重翻译“新史学学派”的著作,独树一帜地开启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在史学思想方面,李大钊与何炳松对历史学的相关概念、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功用等有着许多相似的认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二人在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框架,形成了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李大钊;何炳松;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4-0026-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4.005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Li Daozhao's and He Bingsong's Historical Thoughts

CUI Lu-wei¹, WANG Li-min²

(1. Trade Union Office, Hebei Tourism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2. Lianmeng Sub-District Office in Xinhua District of Shijiazhuang, Shijiazhuang 05007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and He Bingsong are both very influential historia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Li Dazhao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analyze historical issues,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and after which Marxist historians mushroomed in China. He Bingsong focu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New History School, and uniquely began to spread this School in China with Robinson as its representative. In the aspect of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He Bingsong and Li Dazhao had many similarities in related concepts of historiography,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he function of history, but they also had many distinct differences. They built their own histor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formed their own theoretical system while they stuck to their academic viewpoints, which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Li Dazhao; He Bingsong; historical thoughts

作者简介:崔鲁威(1983—),男,河北肃宁人,助理编辑,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一、李大钊、何炳松史学思想的形成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在李大钊出生前6个月其父李任荣去世,母亲在其出生后不久也病逝了。祖父将李大钊一手带大,并将其送入私塾读书。李大钊曾两次参加童试科考并通过县试,1905年,“府试中”正赶上清政府废止科举考试,李大钊因为县试成绩优异,被永平府中学堂录取^{[1]713}。因其具有“生性简易,聪爽绝伦”^[2]的天资和刻苦、勤勉的态度,使得他在进入中学堂后,“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3]。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3年6月毕业,此年底,在汤化龙、孙洪伊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留学。

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并没有专修历史学,而是选择了政治学、经济学、史学、法学、社会学等与社会问题相关的课程,阅读了大量书报杂志。与此同时,他将更多注意力放到了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上,写作了《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政治对抗之养成》《国民之薪胆》等文章,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在此前后,李大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这段经历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条件。

张文生认为在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历史观是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早期多年的私塾教育,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多年的新式的正规的学堂教育和留学生涯,也使他熟悉了中西方的科学文化……他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是有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的”^{[4]74}。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选择,更为直接的是受到了社会革命形势的影响,确切地说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震惊了全世界,也使正在艰难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曙

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开始接受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其史学思想也逐渐形成^{[4]74-75}。

何炳松,字柏丞,1890年10月18日出生在浙江金华北乡后溪河(今罗店乡)。其先祖为南宋何基,人称北山先生,是朱熹得意门生黄干的弟子,创北山学派。父亲何寿铨“不乐仕途”^{[5]522},而是倾心学问,治朱熹之学,专事教学。母亲身出名门,识文断字,知书明理,是南宋名臣宗泽的后裔。良好的家学背景对何炳松影响很大,1894年,4岁的何炳松在父亲的教授下开始识字,直到13岁一直在父亲的严厉督导下读书。1903年春,何炳松参加了童试科考,顺利通过县、府、院的考试,“以高第补县学博士弟子员”^{[5]533}。同年秋,入金华府中学堂,兼习中西各科^①。1906年,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何炳松在中学并未卒业的情况下,被保送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又因其成绩优异,“无试不冠军”^{[5]534},以省公费生身份被派往美国留学。

1913年1月,何炳松抵达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学习史学、政治学。1915年夏,他考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何炳松在美国求学的几年,正是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派”风靡欧美诸国的时期。攻读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何炳松,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后来翻译的鲁滨逊《新史学·译者导言》中,何炳松写到:“他(即鲁滨逊)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6]4}“Robinson(即鲁滨逊——引者注)博士所说的话,虽然统是属于欧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的针砭。”^{[6]14}从此“新史学学派”的学术思想便深深影响了何炳松以及他日后的学术道路。

1917年,何炳松进入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① 何炳松在考中秀才、取得生员资格后,没有继续参加乡试而是进入了新式学堂进行学习,应该是“不乐仕途”的何寿铨为儿子做的选择。

校和北京大学教书,开设了西洋文明史、万国史、历史研究法、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多门课程,编译相关教材,翻译鲁滨逊的著作《新史学》,发表《从历史到哲学》《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新史学〉导言》等论文,系统介绍了鲁滨逊“新史学”的理论及方法,并以其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和史学思想构建。何炳松的史学思想逐渐构建形成。

二、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之比较

(一)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知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以政治为中心对历史进行考察的历史观不同,它主张对社会变革的原因进行经济性的考察,因为从经济关系中可以发现因果规律,抓住决定历史发展本质的经济后,历史学便被提到了科学的地位^{[1]359}。又认为进化的历史观是对落后的历史观的修订,经济的历史观是对政治的历史观的修订,社会的历史观是对英雄的历史观的修订,科学的历史观是对神学的历史观的修订^{[1]361}。因此,要选择进步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历史观,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是探究人类生活及其变革规律的学问。他认为,现在的历史家不仅要“对史实进行细致的考察并加以确定、整理,而且需要去探求历史中的理法,“研究古今东西全般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正为史学家的要务”^{[1]368}。同时,李大钊也看到了历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不同。针对一些人因历史学研究对象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不同而否认将历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观点,李大钊提出了“人事科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与自然科学相互对应而又区别于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科学的学问,用它来描述人类社会及其变革的概念,并将历史学归于此类。他认为,如果仅以研究内容的不同,就认为历史学不能进行事实的概况和“理法”的推理,不具有成为科学的性质,是错误的,“人事”中当然也有“理法”可寻。因为这种“理法”经常会以同一普遍形态反复出现,所以较对一个个的特殊情形

讨论起来更为容易。但由于这种“理法”隐藏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之中,仍然“不易考察”。有鉴于这种困难性,李大钊认为历史科学系统的建立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也正是历史学家应该努力的方向,坚信这一天终将到来^{[1]369-373}。

在何炳松看来,历史含有科学的部分属性。历史的形式和精神虽然远不如自然科学完备和饱满,但是它和科学一样都是有条理的知识,都是本着科学的态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所以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但是,何炳松看到更多的还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从根本上看,他认为历史学不是“纯粹的科学”^{[5]207},历史中不存在因果规律。1924年11月何炳松复函姚名达,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诚以史之为科学与理化之为科学不同……且科学上所谓定律,一层(成)不变者也。史事上果有因果律,即不当再有例外。既有例外,即非定律。鄙意凡百史事,只有源流而无因果……故史家事业在于追溯源流,不在于推求因果。”^{[5]124-125}何炳松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最终将历史完全从科学中分离了出去。

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知,构成二人的史学思想的根本区别。

(二)历史及其相关概念问题的区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选择

李大钊认为历史应该研究“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死的历史”指的是那些史学书籍或是历史纪录;“活的历史”则指“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因此,历史便成了整个的人类生活,同时也是整个的社会变革^{[1]355-357}。由于之前中国学界并没有将历史与历史纪录做科学的区分,因此李大钊成为了“把历史和历史纪录区分开的第一人”^{[7]169}。

何炳松认为历史有两种定义,“一种就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一种就是人类过去活动的记载”。但这两个定义极易使人们头脑中出现混乱,“因为他一方面就指的历史本身;一方面又

可以指历史的著作或历史的书籍”。他同时指出,现在科学上所谓的历史,专指人类过去的活动,而不是指历史著作或历史书籍。他认为仅用“人类过去的活动”描述太空泛,具体应该包括一般历史学者认为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五个方面,并且他作了两点说明:从横的方面讲,是对这五个方面整体内容的研究;从纵的方面讲,是对这五个方面整体变化的研究^{[5]147-148}。

李大钊与何炳松对历史进行了主观与客观的分类。主观的历史指的是历史著作或历史书籍,客观的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二人都主张要研究客观的历史,并要对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研究。横向的研究是对社会的研究,纵向的研究是对社会演变的研究。主观与客观的分类清晰地将历史与历史纪录进行了区分,纵向和横向的研究则为对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开辟了新的途径。这种层次分明的区分将历史研究推进到了更为深入的程度。不难看出,二人对历史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何炳松把“人类过去的活动”进一步具体化了。因此,周文玖认为何炳松在给历史概念下定义时吸收了李大钊的认识成果^{[7]189}。

历史的研究对象自然涵盖了历史的全部内容,即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变革。有了历史的概念、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学的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对历史学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1]365}。这一定义深入地揭示了历史研究对象应以人类为主体,强调了历史学科应以研究变化为本质内涵,既从范围上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也从重点上将个人的历史转移到人类的历史上。在当时来讲此定义已经达到了空前先进的水平。直至今日,在史学的定义上,虽然各家纷纭、莫衷一是,但仍不能完全突破李大钊的这一定义。何炳松虽然没有直接对历史学的概念下定义,但是不难想象其所认为的历史学概念应与李大钊对历史学的定义并无大异。应该说,至此为止李大钊与何炳松在历史的认识上是非常相似的。但

是由于历史观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到了具体的研究中(在研究方法上),李大钊更加注重对历史变革决定性因素——经济关系的考察;何炳松则强调“综合的和变化的一方面”^{[5]147-148},更多表现了对历史综合性的追求。

(三)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差别

历史学研究法是历史研究者在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观决定着历史研究方法的选取。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是历史观,又是方法论。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指社会的变革。人类社会恰如建筑,经济关系构成社会的基址(经济基础);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构成社会的上层(上层建筑)。上层随着基址的变动而变动,适应基址的变动^{[1]357}。根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选择了从经济角度阐释历史,因为历史就是纵向的对于人类社会的考察,而经济关系的变动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历史的走向。因此,“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历史不可”。恰如王学典的评述,“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领域,就要求人们从经济角度去解说和诠释人类历史”^{[8]68}。因为把握住了经济的视角,也就把握住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李大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从经济角度把握历史研究后,将历史研究方法归纳为三个层次:材料的层次→事实的层次→理法的层次。

材料的层次,主要是针对历史材料进行搜集、考订与整理,即“汇集史料进而为精细之研究”^{[1]304}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广泛搜集各类相关资料,去除那些伪、粗的材料,选择那些真、精的材料,使史料为事实的确定提供证明与支持。

事实的层次,是指对史实进行考证、确定和解释的阶段。李大钊认为除了采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实验主义”外,还要综合多种学科的方法,“采用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

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所研究的结果,更以征验于记述历史,历史理论的研究方能作到好处”^{[1]372}。通过多学科交叉、多种方法的应用,来揭示历史真实。

理法的层次,是指在揭示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规律进行探讨的阶段。历史学家“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影响与感应”^{[1]367-369}。李大钊以探究理法为目的的历史研究,跳出了就历史而历史的窠臼,其根本目的是希望把历史与当下相结合,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

由于深受鲁宾逊“新史学学派”的影响,何炳松一开始就带有“新史学学派”的多元综合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在“新史学学派”看来,历史是进步的,应该以进步的历史观为指导,并且要综合各种新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要注重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下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史料,他定能进步的。”^{[6]12}“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好。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同动物的心理学,同比较宗教学研究。”而其中又以社会心理学最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明白人类文化传播的原理”^{[6]7-8}。

在此基础上,何炳松翻译了《历史研究法》。发表在1929年1月1日《民铎杂志》第十卷第一号的《历史研究法》,原稿是何炳松应王云五的邀请于1918年8月7日在上海尚公学校所作的演讲,通俗地讲述了历史研究法的内容,并讨论了历史研究法的三个步骤:搜集材料、分析、综合。“分析”可分为辨别真伪、知人论世、明白意义三个阶段;“综合”可分为断定事实、编比成文和勒成专著三个阶段。整个过程为:搜集材料→辨伪→知人→明义→断事→编比→勒成著作。

就内容讲,史料是起点,事实是终点,中间桥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给者,其顺序为:史料→史料供给者→事实真相^{[5]147-152}。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搜集史料到著作完成中间需要许多环节,而得到史料与明辨事实真相也是有距离的。因此,历史研究法的作用正是指导我们获取历史真相。之后,何炳松从搜集材料、辨别史料真伪、知人论世、明白史料的意义、断定历史的事实、编比成文、勒成专门著作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从而明了了历史研究的各个环节。这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指导、方法论的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由上可知,李大钊更多地从社会历史整体中关键因素的视角去探究历史,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观;何炳松则更侧重从全面综合的角度揭示历史的变化,选择了鲁宾逊多元综合的历史观。在各自历史观的指导下,二人都将历史研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或层次,层层推进式地搭建起了各自的历史研究方法框架和理论体系。

(四)历史学功用认识之异同

历史学的功用就是指历史学所起到的功能和作用,是对历史学进行研究的价值所在。刘知几讲:“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9]杨翼骥也指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10]。

针对传统史学过分强调政治功用、忽视社会功用的弊端,何炳松与李大钊都进行了批评和论述。在何炳松看来,因为人们过去只把历史当作一种为军人和政客们提供参考、借鉴的前车之鉴,所以历史著作仅仅注重因果规律的探讨,以为这就是历史的作用和写作历史的目的,是很不对的。李大钊也认为,传统史学主要是对帝王爵贵起居、谱系的纪录,在社会文化方面,记述则较少。史书只是对主政者行动的见解而成的^{[1]358}。“政治的历史”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社会生活的全部,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就是用部分概括全部,是非常错误的^[11]。在此基础上,二人对传统史学功用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何炳松认为是因为研究历史和地理的人不懂得“进化”的道理,不明白古今环境

完全不同所致^{[5]6}。李大钊把原因归结为历史观的落后,“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1]311}。

李大钊将史学的功用分为智识方面与感情方面两部分。从情感方面讲,读史是为了培养爱国心;从智识方面讲,读史是为了获得观察社会的方法,增强认识社会、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能够给人民一种新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这种历史观改变了“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1]217}。李大钊从爱国情感的塑造、社会能力的培养和人生观的追求三个方面对史学功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在何炳松看来,“历史是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他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现状”^{[5]368}。在《历史研究法》中,何炳松将史学的功用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穷委竟源,博古通今;二是为研究人类科学,提供入门的坦途;三是培养智慧。“培养智慧”是历史的最大功用,其益处包括:一是受史法训练,对研究态度有益;二是对驱除成见有益;三是对了解古今社会变迁、明了人事演化、推进社会进步有益^[12]。何炳松分别从认识社会现状、研究学问之方法、培养和启迪智慧三个方面论述了史学的功用,并将“培养智慧”分为培养科学的研究态度、驱除固有之成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三个层次。

在历史学的功用方面,李大钊与何炳松分别从各自的历史观出发对传统史学功用进行了批判。二人都认为传统史学功用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都主张应当把历史学的落脚点放到现实社会中,并对历史学在认识社会、启发智慧、增进能力等方面的功用都表示认同,但是彼此又是各有偏重的。李大钊更加注重历史学在培养人民爱国情感、树立高尚的人生追求等方面的作用;何炳松更为强调历史在启迪智慧方面的作用,将历史作为一种培养科学的研究态度、

获取社会知识的重要方法。

三、李大钊、何炳松两种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影响

李大钊与何炳松不仅注重西方先进史学理论的引进,更能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历史学的整体认识到具体研究上都不乏有开创之处。二人都构建起了各自的史学思想体系,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在注重拓宽历史学研究思路的同时,二人更加注重推进历史科学化研究的进程,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对当时的史学界及后辈史学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构建起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

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史学体系被认为是评判一个史学家对历史学研究所作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准。李大钊和何炳松在进步的历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的科学性、历史定义及相关概念问题、历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和历史功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了各自的研究框架和史学理论体系,分别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和“新史学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为后辈学者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王学典对中国现有史学格局进行了总体概括:“进入‘新时期’以来的20年,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史学最为活跃、最为开放、最富生机的20年……后20年间,基本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派史学、跨学科史学和所谓‘国学’复兴的三足鼎立格局。这三股史学趋向的起伏涨落,构成了近20年间史学界的总体图景。”^{[8]251} 在我们对李大钊与何炳松史学思想进行研究后,不难发现,对“唯物史观派史学”和“跨学科史学”溯本求源正可以追寻到李大钊与何炳松。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前30年间,中国史学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泛政治化史学”,由李大钊引进并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一直被树为史学的正统形态,但在实质上却已经脱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被歪曲、变形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何炳松的“新史学”理念和研究

方法也只能潜滋暗流地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学者。进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回到李大钊开启的道路上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史思潮的兴起、跨学科史学研究的进步清晰地影印了“新史学”痕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理念及其研究方法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鲁滨逊“新史学”再次发生关联,并成为构成中国新史学格局的两支重要力量。

(二)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新思路

中国传统史学以神权史观为导向,以借鉴为政治功用,将历史记述的内容局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学的发展及其社会功用的发挥。李大钊与何炳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鲁滨逊“新史学”的引进,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新思路。从范围上讲,二人将历史内容定义为“整个的人类活动”,因此历史研究就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研究。就中国史而言,帝王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为历史研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那些尚未被传统史学所重视的、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人民的活动”自然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从方法上讲,“训诂”“考据”是传统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传统历史研究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新学科的建立和新理论的不断彰显,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往往会使历史内容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从而得到更为丰富、更为深入的认识。李大钊与何炳松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鲁滨逊“新史学”的引进与研究实践,借助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古生物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推进了历史学科学化研究的进程

历史学是否为科学的问题一直以来不能形成统一意见,但是必须对历史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则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缺少了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就不能将真实的历史予以还原或是追求最趋于真实的历史。因此,对历史进行科学化研究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条必由

之路。

对于“科学”的地位问题,胡适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做过总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侮辱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思考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努力将历史学建构成为科学。这就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从材料、方法、理论等各个方面冠以科学的属性,对历史进行科学化研究。

何炳松对“科学”虽亦存有敬意,但他不愿意将历史与科学相比附。他认为“历史所谓科学,同化学物理所谓科学,是不同的”,“因为历史材料同他种科学材料不同的缘故”,历史成不了科学,只有“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这种研究自然是抱以科学态度并借助科学方法的^{[6]-7}。这就使得何炳松在否定历史学是科学的同时,坚持了对历史的科学化研究,从另一个视角强调了历史科学化研究的重要性。

李大钊与何炳松虽然在历史学是否为科学的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区别,但在历史需要科学化研究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进行科学化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推进了历史学科学化研究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2] 董宝瑞. 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M]//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大钊与故乡.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82.
- [3] 朱文通. 李大钊传[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27-28.
- [4] 张文生. 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5] 何炳松. 何炳松论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下转第 37 页)

员。在这样危险的处境之下,很多人劝李大钊暂时离开北京,他都谢绝了。奉调去上海的刘清扬请他同行,他却说:“你是党调走的,我担负北方区的工作任务,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6]夫人赵纫兰劝他离开北京,他说:“不是常对你说明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7]

李大钊坚定选择留在革命形势最危险的北京的原因:一是出于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二是出于对自己工作岗位的坚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可以说在逮捕到来之前,李大钊是可以选择离开北京以求生的,可他选择了为革命坚决地“赴死”。这是愿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奉献生命的牺牲精神,这就是李大钊先生在生死观上的价值选择。

面对死亡,他早就做好了准备。革命的形势要求他不能逃避,为了维持他一直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他选择了死在革命的道路上。革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保命的逃跑不能挽救革命、反而会断送革命。他以慷慨的“赴死”证实了革命的必然之势,证实了只有继续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出路。他的精神聚集起了为革命保留的最后的火种,并在中国大地上燃起了星星之火,最终实现了

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求生与“赴死”之间,李大钊展示了他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追求。

李大钊的革命生死观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产物。李大钊对待生死、生命最高价值等问题的理论,既是他个人革命生死观的基本内容,又代表着早期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李星华.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 [5] 李葆华.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N]. 人民日报,1979-10-29(3).
- [6]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 李大钊年谱[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240.
- [7] 何宗禹. 李大钊的故事[M].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8:233.
- [8] 杨翼骧. 学忍堂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2:388.
- [9]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538.
- [10] 何炳松. 历史研究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82-83.
- [11] 胡适. 胡适文集:第3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52.
- [12] 鲁滨孙. 新史学·译者导言[M]. 何炳松,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3] 周文玖. 史学史导论[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169.
- [14] 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 [15] 刘知几. 史通[M]. 黄寿成,点校.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58.

(责任编辑:李亚平)

(责任编辑:李秀荣)